从《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到《中国修辞学史稿》

——评郑子瑜教授的修辞学史研究

张　雪　涛

郑子瑜教授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面世，标志着汉语修辞学经过漫长的跋涉，已经步入了成熟期和繁荣期。

1964年，郑子瑜先生应聘为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这年5月30日在“东京中国语学研究会”上，郑先生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修辞学的变迁》。1965年，这篇讲稿及四篇短文合成一本小册子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这本约五万字的小册子——《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就是第一部汉语修辞学史的雏形。

《变迁》虽然短小，内容却概括了从先秦到现代汉语修辞学发展的全部过程。按照时间的先后，《变迁》分为先秦、汉代、魏晋、南北朝、隋代、唐宋、金元明、清代、现代等九个发展时期，每个时期主要的修辞理论、修辞流派、有关作家的著述及对后代的影响等方面，作者都作了鸟瞰式的述评。

《变迁》在整个汉语修辞学发展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肯定。它是汉语修辞学史的滥觞，是汉语修辞学进入有史期的序曲，是《史稿》的“建筑模型”。《变迁》曾经得到陈望道先生生前的赞赏。

后来，郑子瑜教授在《变迁》的基础上，又历时17年，写成了第一部汉语修辞学史巨著——《史稿》。

洋洋四十余万言的《史稿》，博大精深，内容翔实：作者努力挖掘古汉语修辞资料，或粗笔勾勒，或工笔剖析，或沿波溯源寻绎修辞学发展之轨迹，或评点古例，揣测古人之情趣；称引恰切，论述公允，理脉络，提课题，发见新格，匡正古说之谬，补充《修辞学发凡》之疏；作者深厚的功力每每可见。《史稿》“业已达到了汉语修辞学史研究上的前所未有的高峰”。（李金苓、易浦《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见《复旦学报》1986年第一期。）

下面，我们就郑先生的这两部书，谈些粗浅的研究心得。

一、“经”“纬”交织，体例严谨

郑先生在撰写《史稿》和《变迁》的时候，首先注意到了“经”和“纬”两大方面。“经”则关涉到总论、分期，分期的理由，每一时期的修辞思想及修辞特点，主要流派及其影响，前后代传承联系等内容；“纬”则是评骘作家、作品修辞技巧的得失等内容。“经”是从历时的角度论述的，“纬”是从共时的角度论述的。以上各个方面，由于资料的限制，有些方面可

能显得薄弱，我们不应因此苛求作者，因为古代修辞专著极少，而大量的修辞散论是在其他学科著作中偶尔论及的，有的仅是只言片语，更谈不上系统，这就给“经”的编写带来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史稿》还是写得经纬相当的。郑先生注重了重要作家、作品的评价。《史稿》设了五十二个专节评述作家、作品。专节的设置，显得“纬”线分明，内容充实，而且突出了重要作家、作品在修辞学史中的地位。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在论及修辞学史之某一观点时，还能上溯下联，以见其源流，此为纵观，历时地看问题，故能称其为“史”；但亦旁及左右，以成横观，此为共时地看问题：纵横交织，所以能成宏观之论。如《史稿》第163页论及《文则》谈“数句用一类字”例，作者不仅指出陈骙所论“壮文势，广文义”是正确的，又从纵的方向谈到了丁传靖、范镇等人的有关论述，并指出了“有顿错之功”的修辞效果，这无疑是很可贵的。

《史稿》每篇中的“楔子”和“小结”，是提纲挈领性的概述，是作者用心着力于“经”的部分，显得十分重要。修辞学上的论争这条经线，作者是牢牢地把握着的，在每一篇紧挨着“楔子”之后的专节里，都有详细的论述。如先秦时期的“儒家尚文不尚用，墨家尚质不尚文”之争，两汉时期的“华、质和辞、意”之争，魏晋南北朝的“繁文缛辞”与批评者之争，隋唐时期的“反骈俪而正文体”与“主辞巧”之争，明代的“学古与反学古与修正的学古”之争，清代的“复古与反复古”之争，现代的“新旧两派”之争等等。修辞学史上论争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当是“文”与“质”的论争，整部《史稿》相当多的部分内容都是围绕主张修辞（修饰）与反修辞（修饰）这条经线写的，而论述最多的，可以说是占主要地位的还是主张修辞，而不以辞害义的一方占上风。郑先生在《史稿》第五篇第三节中说：“我要一再指出，大抵古人论修辞，都不太喜欢作一偏之见，先秦两汉如此，魏晋南北朝和以后也一样。自先秦以来，至于隋唐，论修辞专主辞巧的，只有张说、孙樵、皇甫谧、李翱等数人而已。”

二、汉语修辞学史的分期问题

学科史的分期问题是写史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大问题。由于分期标准不同，因而分期法也不同，由此牵扯到对一些关键性材料的评价也不同。

在分期问题上，郑先生依据一定的标准作出了较科学的分期，给修辞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首先区分修辞史与修辞学史，他在《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稿>的体会》（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一期）一文中说：“将各时代诗文中的修辞现象，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史的叙述，夹叙夹议，以明修辞现象的变迁和进化，是修辞史；将各时代的修辞理论（也就是修辞学）作史的叙述，以明修辞思想的萌芽、成熟以至于发展的经过，是修辞学史。”基于这一大前提，所以“人类自有语言以来便有修辞”，“最早的可靠的美辞之篇是《诗》，《诗》是文学作品，遂使我们以为中国修辞的萌芽和发展与文学的萌芽发展同时，而中国修辞学的萌芽和发展也就只能和文学批评的萌芽和发展同时了。”因此，“中国修辞学史的分期标准，也就不能不参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标准了。又因为中国修辞学所论述的修辞现象，取材自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居多，所以又须参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情况而作为分期的标准”。作者层层推导，有理有据地确定了修辞学分期的标准，并分出了萌芽期、成熟期、发展期、革新期……等八个时期。

修辞学的分期主要决定于修辞学本身表现出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史稿》在“绪论”及各篇的“楔子”中都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汉语修辞学发展的大致趋势及各时期的主

要特点。这与《变迁》相比，显得周密一些了。《变迁》只是小标题式地分列了几个时期，至于各时期的特色，主要的修辞理论等内容都没有来得及论述。

《变迁》分出的"隋代修辞学"，这个时期的修辞不具备什么明显的特点，在文学上、修辞学上都还是南北朝时期的延续。再说隋代的修辞学资料也不多，历史又很短暂，所以《史稿》把隋代并入了唐代。唐、宋、金、元都是汉语修辞学上的发展期，因为这个时期的修辞学资料特别多，所以《史稿》把它们分成"延续期""再延续期"。明代为修辞学上的"学古期"，《史稿》把它列成了专章。《变迁》分为"唐宋的修辞学""金元明的修辞学"两章，这显然带有"初稿"的性质。

无论从修辞学的内部因素来考虑，还是从修辞学的外部因素来考虑，我们认为《变迁》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个时期要比《史稿》合为一个时期来得合理些。即使变通一些，把这一时期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个阶段也比合为一个时期要好。这是因为，魏晋时期以"建安文学"体现的修辞特色为代表。南北朝时期以"永明体"诗歌体现的修辞特色为代表。前者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特色，或纵横驰骋，或崇尚质朴，或慷慨豪放；后者讲究声韵格律，选词炼句，绮丽浮艳，是修辞学史上专重修辞形式的鼎盛时期。魏晋时期局势动荡，而文人多积极用世，或抒发建功立业之抱负，或吟咏胸中之积愫，都没有离开现实主义的基调。南北朝时期局势亦动荡不安，但文人多思想空虚，苟安消极，追求享乐，这种思想在修辞学上则表现为"尚辞藻，重对偶，讲声律，喜用事"的形式主义的特征。

形成两个时期还有其政治上、思想上等方面的原因。前期经过汉末黄巾农民大起义，统治者实行了一些让步政策。同时，随着汉政权的瓦解，一元化的儒家思想开始崩溃，而代之以多元化的道家、法家、名家、佛学等思想逐步扩大影响，腐朽的士族门阀制度也逐步加强。这个时期专事雕章琢句的士族文学才刚刚出现，修辞形式与修辞内容两方面比较而言，主要还是重视修辞内容的。后期，特别是偏安的南朝，经济比较发展，门阀势力强大，清议的玄学和麻痹人民斗志的佛学应运而生，士族阶层贪图享乐，崇尚清谈，矜奇炫博，追求捷辩。作为书面语的士族文学则寻虚逐微，雕章镂句，"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修辞内容空泛平俗，而修辞形式却得到充分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畸形繁荣局面。南朝修辞学繁荣局面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四声八病的发现及其在文学创作上的应用。南北朝时期的雕辞琢句的风气再加上对声韵的严格要求，这给一些辞格的形成和成熟创造了极其有利的环境。

总之，我们认为郑子瑜先生的《史稿》，对汉语修辞学分期问题的处理大都是可取的，但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笼统地划在"发展期"内而不加分别地去论述，显得粗略了一些。

三、沿流溯源，挖掘修辞学的珍贵资料

从大的方面来讲，搜集从古至今的修辞学资料，可以编写修辞学史；搜集断代的修辞学资料，可以编写断代的修辞学史。从小的方面来讲，如果搜集某一种修辞方式、方法，譬如某一个辞格的资料，也可以写成一个小规模的辞格史，假如从事这一有意义的工作，那么探求某一方面修辞现象的源头，是相当重要的。《史稿》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史稿》第八篇之七，引顾炎武《日知录》说"重言"始于《诗》《书》，分同义异形、同义同形两类，同义同形就是"叠字"。叠字之最，顾氏认为是古诗《青青河畔草》连用六叠字。郑先生纠正说叠字之最当是韩愈的《南山诗》和李清照的《声声慢》。

郑先生又引顾炎武的话："按嫌名之有讳，在汉未之闻。晋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及薨，荆州人为祜讳名，室户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此讳嫌之始也。"（顾说未必可靠，讳名起于尊称，孔丘的弟子就知讳名了。）

我国第一部语法著作是马建中的《马氏文通》，一般人只知道它本于拉丁文法。《史稿》第八篇之十一说，唐彪的《读书作文谱》，"其卷七有一部分论文法，实为马建中《马氏文通》所本"。郑先生这一发现恐前人尚未论及，研究"马氏"之学者不可不注意。

何谓修辞？《史稿》第八篇之六在谈到清代"论辞与意"时，引颜元《法孔》云："修辞之功，全在未言之前；但得先一思方出口，便得力矣。"未言之前先思之，未写之前先虑之，意先于辞，辞以载意，意以辞显，而由意到辞的全过程就是修辞。这对"修辞"的定义可备一说。

回文的起源，有的说是起于魏曹植的《镜铭》，有的说是起于晋温峤的"由贞起元"，有的说是起于符秦窦滔妻苏蕙的《织锦回文诗》，郑先生指出孟子的"尔为尔""我为我"才是最早的回文。

引用是很有用的一种辞格，但引用如果发展到"集句"的地步，便是近乎迂阔或是文字游戏了。那么引用什么时候发展到集句的呢？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说"荆公始有集句诗"。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与元王构的《修辞鉴衡》也都说集句始于宋。后来有人指晋傅咸的《集五经诗》是最早的集句。郑先生的《史稿》则引清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据《路史·发挥》之说，指出最早的集句要算鲁哀公《诔孔子文》。

如果有人要写一本"比喻史"之类的小册子，那么《史稿》会提供不少这方面的资料。除了第六篇引《诗人玉屑》语，指出苏轼作诗善用譬喻的例子外，《诗人玉屑》卷二又引敖陶孙的《臞庵集·臞翁诗评》，评论魏晋至敖氏同代（宋）的二十九位诗人的风格，"全文用譬喻的修辞法，一气呵成"。《诗人玉屑》又引《西清诗话》，评十四位诗人的修辞技巧，全用譬喻的方法来下评语。《复斋漫录》引张舜民评各家诗的修辞手法，也都用譬喻。《史稿》第七篇小结中说王世贞的《国朝诗评》，"文长二千余言，评述自明初至嘉靖年间一百零八位诗人的诗的修辞技巧，也是全部用譬喻的手法写成的"。为什么评论诗人的风格技巧要用譬喻的手法呢？郑先生告诉我们："要正面描述各家诗的修辞技巧，确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自来评诗者都喜欢用譬喻手法，所谓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比较容易使人明白。"

四、搜求资料，沙里淘金

编写《史稿》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单就资料而言，也是够棘手的了。汉语修辞学历时两千余年，古代修辞专论寥寥可数，而大量的修辞学资料则散存于古人经解、文论、杂记、诗话、词话、曲论等著作之中。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大抵以前之论修辞者，往往不免有二弊。其一在于泛，弊在不专从修辞本体立论；又其一在于狭，弊又在只从修辞的局部立论。由前者而言，所以没有纯粹论修辞的书；由后者言，所以虽亦论到修辞的方面而不能包括修辞的全部。""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寻找资料犹如沙里淘金，往往须读遍了他们的文集，才能偶尔发现三言两语，或一段话是有关修辞的理论。"（郑子瑜《编写〈中国修辞学史稿〉的体会》，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下同。）还有一种情况与此恰恰相反，那就是"针对前人诗文的修辞技巧之高下得失的评论之作，在诗话笔记或其他著作中，犹如万花吐艳，目不暇给"。这又要下一番细心筛选的功夫。单是《史稿》引用的诗话、词话就有八十余种，由此可以想

见郑先生所付出的辛劳。

《史稿》第六篇第十节，郑先生说："苏轼的诗文，善用譬喻，《容斋三笔》卷第六曾加以论述，并举《百步洪》诗以为例证。但这里所举各诗用譬喻，都不能算是子瞻用譬喻之最佳者。《苏轼诗集》中有一诗两用譬喻的，有一诗三用譬喻的，有一诗四用譬喻的，有一诗六用譬喻的；有二句连用譬喻的，甚至有一句之中两用譬喻的。以上所举的，都是明喻的修辞法，暗喻和借喻的尚不在举例之列。"郑先生在这段文字中从六个方面一口气举了十五个例子。遍览《苏轼诗集》查找出十五个最佳的明喻，真佩服这种"沙里淘金"的功夫。

五、评述公允

如果说搜求资料如沙里淘金的话，那么评述它们的得失利弊则又要求作者具有"点铁成金"的本领了。古人的"成例"都带有时代局限性和个人局限性，评述这些资料在修辞上的得失，必定显示出作者的观点是否正确，挖掘是否深刻，论断是否精当，而这些又与作者的学识与功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应该看到，郑子瑜教授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

我国古代到底有没有修辞学专著？如果说有的话，那么有哪几部？第一部应该是什么？郑先生在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之后，在《史稿》第七篇第七节中作了论断："谢榛的《四溟诗话》是中国修辞学史上继(宋)陈骙的《文则》与(元)王构的《修辞鉴衡》之后第三本论修辞的专著。若将诗与文分别来讲，则陈骙的《文则》是中国修辞学史上第一本偏于论文的修辞专著，而《四溟诗话》却是第一本偏于论诗的修辞专著。自此以后，历经三百余年，直到'五四'时代才再有修辞学的专著出现。"郑先生在《变迁》中也指出："成书于一一七〇年的《文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专谈修辞而又比较有系统的著作。"对于元代王构的《修辞鉴衡》，作者评说比较谨慎，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以'修辞'题书名的著作"，"虽然名称是修辞的专书，但实际上对于修辞的研究并没有什么贡献"。陈望道先生说"《修辞鉴衡》一书虽不甚精，似乎还是可以算是修辞专书的滥觞"，似陈望道先生那时还没有发现到堪称为第一本修辞专书的应该是《文则》。郑子瑜对《修辞鉴衡》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文则》、《四溟诗话》以及《文则》以前的著作也有深入的了解，否则这"第一""第二"是不便轻易下断的。

郑子瑜看问题的方法是科学的，进步的，如：《文则》中论述以今语写今事，反对"搜摘古语，撰叙今事"，郑子瑜认为"时代不同，言语演变，所以在当时是常语，而后人却视为艰深之文"，并评述陈骙的观点是"符合于进化的观点和大众的要求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论点出自汉王充的《论衡》，晋葛洪的《抱朴子》"。由于郑先生重视语言演变这一客观规律，不厚古薄今，所以《史稿》不少篇章引述了有关俚俗语入诗入词的问题，作者十分注意人民口语中活的语言，充分肯定了以俚俗语入诗入词的进步意义。对于那些鄙视俚俗语的迂阔的封建文人，作者都给以恰如其分的批评。

作者在引述古代修辞资料的时候，或指出其所用的修辞手法，或解说其内在的涵意，或考证版本，或推究事理，或体察情味，多能挖掘深刻，评述公允，切中事理和美的韵味。如：《诗人玉屑》引《缃素杂记》引李义山《锦瑟》诗，苏东坡作解，作者又给东坡之解作解，寻根求源地说解"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兰田日暖玉生烟"四句，具体地揭示了这四句诗"适"、"怨"、"清"、"和"四种意境。

即使是老生常谈的例子，引述时往往能发现新意，表现出作者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

六、指出《发凡》之所本，补充《发凡》之不足

《变迁》、《史稿》所依据的修辞学理论出自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但郑先生的态度是很严肃的，遇有与陈先生不同的见解，能毫不隐晦地提出来商榷。他的《论照应》这篇书信式论文，《变迁》和《史稿》都用作附录。其内容是与陈先生讨论“照应”的修辞法。《发凡》中举出“沽酒市脯不食”等四个例句，以为是“欠照应”的修辞病句，郑先生明白地指出这是“偏义复辞”的应用，并一口气举出了“亲戚”、“兄弟”、“姊妹”、“异同”、“衣裳”、“杨柳”、“池塘”、“荣辱”、“公姥”、“中外”等一连串的偏义复辞。这几个例子中，除“异同”一例有两解之外，其余都是很恰当的。

何谓“飞白”？《修辞学发凡》上说：“明知其错故意仿效的，名叫飞白。所谓白就是白字的白。”那么“飞”是什么意思呢？陈望道先生未作说明。《史稿》第九篇的注释⑥，作了较详细的解释。“陈氏所订的三十八个辞格中，只有将故意运用白字的一种修辞手法，称作‘飞白’格。我认为有更改的必要，因为飞白原是书体的一种，其体笔画枯槁而中空，始创于汉代的蔡邕，（宋）欧阳修有《仁宗御书飞白记》，苏轼有《文与可飞白赞》。用飞白作辞格的名称，容易使人与书体混淆。”《史稿》第六篇之十四中说：“《书苑菁华》引(宋)黄伯思云：‘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郑先生这么一解说，飞白格的来龙去脉便真象大白了。至于辞格借用这个名称好不好，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文镜秘府论·定位》篇云：“其为用也，有四术焉：一者，分理务周……二者，叙事以次……三者，义须相接……四者，势必相依……”郑先生指出：“这与陈望道氏《修辞学发凡》第四篇论消极修辞四要项，几乎完全吻合。”

《史稿》第八篇之十一，在论述（清）唐彪的《读书作文谱》时，郑先生说陈望道先生的三十八个辞格“其中有一些辞格，可能取自《读书作文谱》，或受《读书作文谱》的启发而得的。”郑先生在“绪论”中还指出：“至于积极修辞（辞格）论，也是始盛于宋人的诗话、笔记之类的著述之中。实际上，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所举的三十八个辞格，大部分已在这个时期论述过了，而且也举了不少的例证；只是辞格的名称或与陈氏所定的未尽相同，也不曾像陈氏那样替各个辞格立下了精辟而又明确的定义而已。”

指出陈望道先生《发凡》之所本是颇有益的。既然是“史”，就有必要从“历时”的角去观察研究，使人们从纵向上看出各种修辞现象继承、创新、发展、演变的轨迹，此其一。其二，继承前人的成果，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提高，也是合乎科学史发展规律的。

※　　※　　※

综上所述，郑子瑜教授的《中国修辞学史稿》是汉语修辞学的第一部学科史，它在汉语修辞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应予充分的肯定，《史稿》的前身——《中国修辞学的变迁》的开创之功也应予充分肯定。《史稿》的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评述中肯，博采历代修辞学“成说”，上溯下推，探索修辞学发展的规律，系统地论述了古今修辞学的成果，展示了这门学科学发展变化的整个历程，创建了汉语修辞学史的科学体例。《史稿》和《变迁》都有瑕疵，但是瑕不掩瑜，它们的贡献还是巨大的。